

回忆跟周恩来一起行军的日子

王治国



1947年,周恩来在转战陕北的行军途中

1947年3月,国民党调集优势兵力向我陕甘宁边区发动“重点进攻”,企图一举消灭我军主力,夺取延安。为粉碎敌人的“重点进攻”,中央军委和毛主席制定了英明的战略决策,于3月19日主动撤离延安。战争的气氛笼罩着整个陕北高原。

当时,我任延安八路军总兵站部管理员,奉命负责转移总兵站部的重要文件和贵重物资,护送年老体弱、残疾有病的干部和家属子女转移至安全地区。我将他们送到绥德县义合区的深沟村后,巧遇兵站部运输处长惠世荣同志。第二天,我俩结伴寻找总兵站部。

在我们行进的路上,发生了意想不到的、使我终生难忘的事情。

那是4月中旬的一天,我们一路快马加鞭,到太阳快要落山的时候,赶到了子洲县的双湖峪镇。我俩商量:到镇子里探听一下消息,了解一下地形环境,给跑了一天的马喂点料,人也休息一下,顺便弄点吃的,然后继续赶路。大约离镇子有100多里时,老远看到镇边的一小块山坡上围着许多人在谈论什么,气氛十分活跃。我俩挺纳闷:在这种紧张的战争环境中,是什么人还在这里有说有笑?走近一看,原来是周恩来副主席与他的随行人员在和当地老乡谈话。

周副主席看到我们牵马走过来,热情地向我们打招呼:“你们俩是哪个单位的?”“是总兵站部的。”我们回答说。“到哪里去呀?”周副主席关切地问。“我们到前总部去!”周副主席仔细询问了一些具体情况。最后他说:“那好,你们就不要走了,今晚就住在这里,咱们明天一起走!”

说话间,周副主席的警卫人员热情地把我俩带到他们住的院子里。这个大院里,住的全是部队的同志。老乡们一面忙着给我们的马喂草料,一面给我们的住处铺炕席。在和其他同志的交谈中,我们得知周副主席只带了一个秘书、一部电台和六七个人组成的骑兵警卫班。其余的人,都是周副主席在途中收留的掉队的干部战士。

刚吃过饭,周副主席就派秘书把我们五六个人收留的干部召集到他住的窑洞里开会。他用亲切的目光看了看大家,问道:“来齐了没有?”“来齐了,副主席。”秘书回答说。接着周副主席对大家说:“同志们!自从党中央撤出延安后,形势变化很快。我是到吴堡、佳县一带看了战备情况后返回来的。在这里把大家留下,好不好啊!”大家面面相觑,没有一人吱声。

周副主席继续说:“你们知道部队在哪里吗?敌人已经到了哪里知道吗?你们单独行动,遇到敌人怎么办?”这时,大家已经明白了八九分,情绪顿时活跃起来。“我知道大家心里很焦急,都想早点回部队去工作,去战斗!因为你们是革命队伍里的骨干,但为防止遇到敌人的突然袭击,避免意外损失,为了战争的胜利,所以,我们要一起走。人多势众嘛!又有这么好的群众带路,我们什么都不怕,对不对,同志们?”周副主席接着给我们讲述当前的形势,他说:“胡宗南集中了11个师、25个旅约20多万人。可我军呢?在陕甘宁边区只有2万多人。敌我兵力比例是10比1,敌人的胃口很大,妄想一口吞掉我陕甘宁边区。可是,我陕甘宁边区军民在毛主席的英明领导下,运用诱敌深入、各个击破的作战原则,打击了敌人的嚣张气焰,已经取得了初步胜利!”说到这里,周副主席显得很兴奋。他随手解开两个衣扣,继续说:“我军在彭德怀司令员的指挥下,避开与敌人正面接触,集中兵力,攻打他们兵力薄弱的地方,打得很出色。3月13日,敌人向我解放区扑来,在延安南边的劳山一带就遭到我军阻

击,我军歼敌5000余人。19日,我军按党中央的部署,主动撤出延安。敌人得意忘形,到处寻找我主力决战。我军采取以少数兵力诱敌主力至安塞方向,使敌人造成错觉,大部分兵力则到延安的东北方向集结,待机歼敌。”

讲到这里,有一个同志急切地问:“打了没有?打得一定很漂亮吧!我早就知道,让胡宗南占领延安,不会给他好果子吃。”“别乱插话,听周副主席讲。”大家都想早点知道当前的形势,就制止那个同志说。周副主席也不介意那个同志的插话。他喝了一口水,接着说:“3月25日,进犯青化砭的敌31旅直属队和一个团3000余人被我伏击,经1个多小时的激战,被全部歼灭。首战就给人以歼灭性打击,极大地振奋了我边区全体军民。4月14日,也就是前两天,我军采取机动灵活的战略战术,在羊马河苦战6个多小时,全歼敌135旅。敌人不仅没有找到我军主力决战,反而到处碰壁,连吃败仗。现在的基本形势是:敌人士气沮丧,人心不振,而我军则越打越强,决心再歼敌人有生力量,最后获得全胜!同志们!现在敌主力又

在向绥德进犯了,离我们这儿只有十几公里。”说到这里,大家的心情一下紧张起来,都不约而同地为他的安全担心。可周副主席却处之泰然,神态自若。他提高声调说:“现在我军准备打第三个仗。我相信,我们一定会胜利的,你们说是不是?我们要让胡宗南知道,共产党不是好惹的!好了,时间不早了,同志们休息吧!”

第二天,天刚蒙蒙亮,大家都起床了。我揉了揉眼睛,定神一看,周副主席已经从外面散步回来了。我赶紧收拾好行装,匆匆忙忙吃了早饭。我们十几个人每人牵一匹马,由向导带路,和周副主席一起沿着大路向周家店、石湾方向走去。在行军路上,周副主席谈笑风生。他和向导边走边拉话,向他们了解周围的地形、社情。我离周副主席很近,他们交谈的内容我听得清清楚楚。周副主席先是亲切地询问向导家里的情况,又让他谈对党的政策的理解,老百姓有什么反映。一路上,大家都全神贯注地听着周副主席和向导的亲切交谈。“前面是什么村?离这儿几里路?村里有多少户,多少人?”周副主席提的这些问题,向导都详细准确地作了回答。周副主席没听清的地方,向导就提高嗓门重复一遍。警卫员想劝说向导说话声音小点,但周副主席摆摆手,毫不计较这些。“翻山过去是什么村?离这儿几里路?村里有多少户,多少人?有多少户地主富农?有多少户贫苦农民?有没有国民党军政要人的家?有没有我们党的领导干部的家?”一连串问题,与其说是行军,倒不如说是周副主席在搞调查。中午,大家在一条河边的小树林里休息,周副主席指着自

己的干粮招呼大家:“来,一块吃饭吧!”“我们都带有干粮,副主席。”大家都拿出自己的干粮,和周副主席围坐一圈,啃一口干粮,喝一口凉开水,别有风味地吃了一顿“野餐”。休息后出发,警卫员向周恩来恳求道:“周副主席,请骑着马走吧!”“向导都在步行,我们怎么能骑马?大家还是同甘共苦好!”周副主席边解释边迈开大步,很有精神地向前走去。两天的徒步行军,周副主席没有显出一点倦意。后来,我们才知道,周副主席有马不骑是他胸有成竹,有意安排的。最主要的意图,一是宣传群众,让群众都知道毛主席和党中央没有离开陕北,仍然指挥着陕甘宁边区的斗争;二是和敌人周旋,我们大摇大摆地行进,使敌人无法掌握我主力部队的活动规律和地点。

当天晚上,周副主席召集我们几个干部到他住的窑洞里,十分关心地问大家:“累不累?同志们。”“不累!”我们异口同声地回答。“用热水烫烫脚,明天我们好继续赶路。”这天晚上的会开得很短。最后,他面带笑容地说:“告诉大家一个好消息,敌人已快到绥德城了。这样一来,又给我们创造了歼敌的机会了。”这就是5月2日至4日攻克蟠龙的战役。大家听到这个消息,都忘记了疲劳。

两天的行军结束了。晚上,我们又到周副主席住处开会。像初次见面那样。他环视一周,看看每个同志的神色,很轻松地说:“咱们已到了安全地带了,一路上,有马不骑,大家有意见了吧?”大家互相看了看,一个四川同志笑着风趣地说:“有啥子意见嘛!这样的锻炼机会,别人想要都要不到,和副主席一起走,再走几天也要得。”大家都会意地笑了。周副主席说:“还想去哇?为了革命工作,咱们要分手了。你们几个同志(指联防司令部、后勤部、一野后勤部、西北局及边区政府的五六个同志)明天起由惠处长负责向南带回前总,我们明天走西川。”

两天三夜的共同生活,一幕幕地刻印在我的脑海中,周副主席的一言一行,一举一动,直到今天,都使我难以忘怀。

(张宏伟 党自祥整理)

刘鹗与洋务运动

许文金



刘鹗一门心思抱定实业救国的信念,并且毫不气馁,还表现为积极参与洋务运动。尽管满清政府一度夜郎自大,采取闭关自守的政策,但其脆弱的国门却始终未能挡住西方列强的侵入;西方资本主义思潮更是破门而入。不少有识之士在这股汹涌澎湃的思潮冲击之下,受到启发;朝廷中一部分官员也受到影响。他们都在思索兴邦强国的药方。资本主义的经营模式为一部分人所津津乐道。朝廷重臣李鸿章、王文韶以及张之洞等,便是这方面的领军人物。于是,洋务运动应运而生。

32岁时,刘鹗自动请缨,投效黄河河工,断断续续有七、八年之久。因成绩卓著,为福润连续两次举荐,于36、39岁时,先后咨送总理衙门考试,结果不过授其空衔。从此他仕途无望,便专心于实业与洋务了。

初师破晓

黄河任上,刘鹗卓有建树,加之有东抚福润连续保举,一时震动朝野,使其声价大增。结束山东河任以后,虽曾处于天子脚下,朝廷却没有给他派上什么具体差事;于是,再次步入无根的生活。但他是个不甘寂寞的人,面对当时方兴未艾的洋务运动,他不可能坐视旁观,相反,却跃跃欲试,跃跃欲行,积极参与。

首先,他极力倡办“芦(沟桥)汉(口)铁路”。光绪22年,即公元1896年的夏秋之交,他应督鄂张之洞之召去湖北参办路矿。结果却出现了意外。因为他碰到了一个特殊的共事对手。此人叫盛宣怀。此何人?他就是后来把只手可以遮天的“红顶子徽商”胡雪岩扳倒的那位。盛宣怀是李鸿章、王文韶手下的能员,官居四品京堂。论官阶,论资历,论人气,论话语权,刘鹗岂能与之抗衡?刘鹗即使再有再好的主意和谋划,也因人微言轻而难受重视。这里,我们姑且撇开其它史料的佐证,仅从刘鹗写给李德铭(子新)的信即可窥其真相。信中说:“子新表弟下下:兄十一日到汉口镇,既过江,知香帅(即张之洞)电召,为欲将铁政、铁路二事并归兄办。及到,又变计矣。前日电召盛杏荪(宣怀)来。盛称:洋债借不动,香(帅)又变主义(意)矣。数日之间,业已三变,此后尚不知如何变法也。今早,王幼云(文韶)到,已嘱其抄铁路章程。”

不难解读这封信:张之洞明明是专电请刘鹗去的。并委以重任:“将铁政、铁路二事并归”刘鹗办理。可当刘鹗兴冲冲赶到时,半路上杀出个程咬金,张之洞又抽出一张王牌,让盛宣怀插手其中。

《清史稿·盛宣怀传》载:“(宣怀)光绪五年署天津

道,时冯璋督畿辅,方向新政(指洋务运动),以铁路、电报事专属宣怀。十八年,(盛)弥(补)汉口冶铁厂亏耗,于是之洞奇其才,与王文韶交荐之,遂跃四品京堂,督办铁路总公司。”短短数语,一目了然。刘鹗同盛宣怀相比,大矮一截,岂能有他说话做主的份!为此,张之洞前后三变,就不必去考量他仁兄是否属于没主心骨的人了。是啊,你刘鹗毕竟是个后起之秀,甚至也不是什么科班出身,毋庸只是个空有其名的候补道了。结果只能是不欢而散。为此,刘鹗是有牢骚的,他在《鄂中四咏·登伯牙台》诗中写道:“此地知音寻不着,乘风海上访成连。”

再师风云

刘鹗脉搏里流淌着富国养民的热血,刚刚在盛宣怀面前吃过闭门羹,可他却心有不甘。这年秋天,他又上书王文韶,鼓动请筑津镇铁路,当局者已经接受了这个方案,可又被两柄横刀砍断。一是张之洞力主修筑京鄂铁路。不用说,刘鹗的津镇铁路的方案只能靠边站;另外一刀,不仅下刀狠猛,而且上演了一幕闹剧:因为,按照刘鹗的方案,铺设一条以天津为起点,镇江为终点的铁路干线。因镇江没有长江大桥,火车不能过江,只能通到镇江对岸的瓜洲。为此,一时引起镇江京官的大哗。他们认为,镇江本是长江水陆要冲;这样一来,镇江市面势必北移瓜洲,岂不端了镇江人的饭碗?于是,群起而攻之,扬言要开除刘鹗的乡籍(刘鹗祖籍镇江丹徒);轩然大波,使刘鹗成了众矢之的。

三师波折

刘鹗就是刘鹗,他是个永不言败的人。罗振玉在《五十日梦痕录》中还写道:“(注:经过以上一番折腾后)……而君之志不衰,授予书曰:嵩目时艰,当世事百无一可为。近欲以开晋铁谋于晋抚,俾请于朝,晋铁开则民得其养,而国可富也。国无素蓄,不如任人开之,我严定其制,令三十年而全路矿归我,为此则彼利在时,而我之利在万世矣。”刘鹗的创意,就是“招商引矿”。直到当今,我们的招商引资之说,仍是袭用刘鹗的思路。一百多年前的刘鹗,能有此创见,有此谋划,确属高瞻远瞩!……

于是,就有了这一年的山西之行。1899年,刘鹗从庆亲王奕劻那里获得批准,让意大利商人罗沙第组织“福公司”,由英商投资开采,确定三十年后,矿路全部交割中国。为交涉此事,刘鹗接连三赴太原。公司成立后,刘鹗作为满清政府代表,出任华人经理。刘鹗认为他的努力是圆了他的中兴国家之梦。在这一阶段,他激情四溢,写下了不少诗作。他在诗中放歌:“一路弦歌归日下,百年经济起关西。”“不向杞天空堕泪,男儿意气古今齐。”(《宿明月店》)这高昂劲力确是发自肺腑。因为在他的心目中,他的“以养天下为己任”的理想彼岸在即,自己为此也可以一展鸿图,可遂平生之志。所以他还豪吟:“眼底关河秦社稷,胸中文字鲁春秋。”

刘鹗在福公司担任华人经理大约有六年之久,势必引起一些人的眼红和猜忌。而正当刘鹗招商引资、筑路开矿的畅想曲拉开序幕的时候,山西京官邢邦彦,云南举人沈葆章联名举奏,对此举横加挾伐。称“该员垄断矿利,贻祸晋陕,请查拿递解回籍,交地方

官严加管束”;一时,弹章不断,舆论哗然。朝廷也不问究里,批奏曰:“方孝杰,刘鹗二员,声名甚劣,均着撤退,毋令与闻该省商务。……欽此。”后来,赖有胡聘之挡了一阵,极力为刘鹗开刷,又适逢“戊戌政变”于是年9月21日发生,否则,刘鹗恐怕难逃一劫。

刘鹗参与洋务运动,三出其师,就这样不吃羊肉却惹了一身腥臊!为此惹出诸多波折,也为日后被人诬陷,植下了祸根。

终成一举

刘鹗无时不在奉行自己的人生信条。在“戊戌政变”期间,他与友人赵子衡曾倡议过“治国莫重于养民,为政莫先于立本”的政见;虽不在其位,却谋其政。福公司的事,风波迭起。按理说他该激流勇退才是;可谁知他有一股犟劲,还是被卷了进去而难以自救。他动议铺设“道清铁路”,几经磨难,虽获批复,而结果仅铺设了从道口到清化镇的一段而已。刘鹗连年倡导铺路开矿,上下呼号,筑路之举跟他扯得上关系的,得以完工的,也仅此一段而已。

值得一提的是:刘鹗自光绪丁酉(1897年)参加福公司。到1902年便告一段落。其间经历,仍属厘清。期间,为争国权,他拟定的章程,于国于民,皆有所利。现有历史文案可考:《河南信丰公司与英商福公司订办河南矿务章程》。

其第六款云:“所办矿务,每年所有矿产按照出井之价值百抽五作为落地税报效国家。每年结账盈余,先按用本付利息五厘,再提公积一分,逐年还本,仍随本减息,俟用本还清公积即行停止。此外,所余净利提二十分归中国国家……如有亏折,与中国国家毫不相干。”

第九款云:“福公司所开之矿,以60年为限,一经限满,福公司所办各矿,无论新旧,不论盈亏如何,即以全矿机器及该矿所有料件并房产基地河桥铁路,凡系在该矿成本项下置办之业,全行报效中国国家,不求给价,届时由豫丰公司(为清廷官办之公司),禀请河南巡抚派员验收。”

毫无疑问,《章程》各款,既争国权,又保人权;皆于国计民生有利。纲目清楚,有章可循,明确利害,利责两清,如付清廉刚正之官督办,当会大有利于中国。刘鹗亲手拟定的这个《章程》,本无懈可击;可是,等到后来官方与洋人交涉时,却出现了暗箱操作。诸多限制洋人利益的条款已成形同虚设。那么,人们势必疑问:刘鹗为此该会成为不受洋人欢迎的人了?为什么当初会成为福公司的华人经理呢?理由很简单,因为双方都找不出可以替代这个角色的合适人选。而刘鹗在此期间,仰仗庆亲王奕劻,还有李鸿章、王文韶等权臣都能为其作援手,所以,一度能呼风唤雨,炙手可热。

前事未了,可到了光绪34年,即公元1908年,也就是刘鹗脱离福公司已有六年之久的正月十二日,报纸上突然刊出《上喻》,文曰:“开缺山西巡抚胡聘之,前在巡抚任内,昏谬妄为,贻误地方,著即革职。其随同办事之江苏候补道贾子咏,已革职知府刘鹗,胆大贪劣,狼狽为奸。贾子咏著革职,永不叙用;刘鹗著一并永不叙用。以示薄惩。欽此。”就这样,刘鹗为了倡办洋务,上下呼号,狼奔豕突,结果却授人以柄!呜呼,岂不是蹉跎一次浑水?!



龙窝巷

纪成效

从淮安区镇淮楼北面沿镇淮楼西路向西走,穿越漕运广场,经过热闹非凡的上坂街,没几步,便来到了古城淮安的另一条名巷——龙窝巷。

龙窝巷巷门黑瓦飞檐,很有气势,灰白色的岩石上刻有“龙窝巷”三字,笔力遒劲,大方得体。

巷道上下铺着的石板,坑洼不平,历史沧桑尽显。巷道不宽,在绘有龙形图案的墙壁映衬下,越发显得幽深、古典。走进古巷,一股浓郁的古巷之气迎面而来,不到几十米,便可看到一座直插云霄的高楼建筑——中华龙窝楼。

龙窝楼坐西朝东,檐牙高啄、斗拱林立,气势磅礴。龙窝楼的正门上悬挂着一块匾额,上写“宋太祖下榻处”几个字。大门两边立着两块石碑,一对大木门上钉着一排排的门钉,显得既威严又古朴。

看到“宋太祖下榻处”这几个字,我明白了这条巷子叫“龙窝巷”的原因了。

龙窝巷的得名,共有三种说法。一是因曾是宋太祖赵匡胤下榻之处而得名。据《旧五代史》载:后周显德五年(958年)正月,赵匡胤率领军攻克淮安,曾于此下榻13天,至今已有1060年历史。二是说龙窝巷是因为曾挖到一窝蛇而得名。蛇,有小龙之称;加之此巷毗邻文渠,这一窝蛇安居于此,也就是“龙窝”了。但更多的人说龙窝巷是因巷内有一眼千年的甘泉古井而得名。淮人汪铭业在《淮安龙兴禅志·大圣堂》中记载:唐中宗景龙二年,泗州僧迦大士游市口,见淮郡西北坊丰登桥下有古井。俗传井通海,有龙藏其中。当以某年暴雨,郡城沉没,僧迦因架石井上为高台,台上建堂,以制龙怪,后称为大圣堂,亦其桥为大圣桥。清《山阳县志》云:“甘泉井,俗名:龙窝,在丰登桥侧,传与海相通。又云,通淮上,建大庙镇压之。”古井在巷子改造时被填埋在房下了,大圣堂也被拆除了,现均已不复见,真是有点可惜。

现在的龙窝巷已经修缮一新了,但仍能从石板的凹凸中找到历史的遗迹,从而窥见蕴含在其中的辉煌与繁荣。

